

新移民研究

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 ——美国旧金山湾区田野调查札记

王 维¹, 钱 江²

(1. 日本香川大学经济学部; 2. 香港大学 亚洲研究中心)

[关键词] 旧金山湾区; 东北新移民; 移民网络; 社会资本; 社会资源配置

[摘 要] 在田野调查访谈的基础上, 本文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中国东北新移民为研究实例, 对社会资本和非制度性的社会资源配置在当代中国的跨国移民活动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进行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 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东北新移民已开始成为当代中国国际移民潮的主要成员之一。近10多年来东北地区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移民海外的现象, 其中既有古典经济学移民理论所提出的经济层面的原因, 也有中国社会内部制度变迁的深层因素。而非制度性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中的强、弱两种关系网, 尤其是海外新移民社会中的弱关系网络, 则对当代东北人的跨境迁徙活动及其在海外移居社会寻找工作等方面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 D634.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6)02-0001-13

Migration Networks, Soci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New Migrants from Northeast China: Fieldwork Notes from San Francisco Bay Area

WANG Wei¹, QIAN Jiang²

(1. Faculty of Economics, Kagawa University, Takamatsu, Kagawa, Japan;

2.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Key words: San Francisco Bay Area; new migrants from Northeast China; migration networks; social capital; soci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Abstract: Based on fieldwork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studies new migrants from northeast China with a focus 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roles played by social capital and non-institutional soci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current Chines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utflow. The authors argue that while new migrants from northeastern China provinces have rapidly emerged as one of the major cohort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ave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y are on the whole lacking solidarity and internal cohesion, resulting in a less success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seas. Different driving forces have been at work in terms of mass outflows from China's northeastern provinces since the 1980s. Of them, economic

[收稿日期] 2005 12 04

[作者简介] 王维, 女, 日本香川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钱江, 男,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motivation advocated by classical economics migration theory and a hidden pushing force triggered by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could be advanced as the two leading factors. A closer observation would also reveal that “Strong Ties” and “Weak Ties”, the two types of network in non-institutional soci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ing towards the transcontinental emigration from China’s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nd the job seeking success among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society overseas, the weak ties existing in the new migrant communities in particular.

近年来, 中国新移民课题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同仁的关注。然而, 过去数年有关新移民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福建人和浙江温州人身上, 甚少有学者将目光投向近 10 年来悄悄崛起的东北新移民群体。2004 年初, 笔者利用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之机, 顺便对旧金山湾区库普提诺 (Cupertino) 与山景城 (Mountain View) 一带的东北新移民、特别是沈阳人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访谈。由于篇幅的限制, 不可能将所有的访谈记录都浓缩在一篇文章中呈现给同行及读者。因此, 笔者挑选了两则具有相当代表性的移民个案访谈记录, 希望在勾画东北人移居海外的过程及其在移居地生活概况的同时, 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入手, 对当代中国跨国移民活动进行一些实证性的分析和理论层面的思考。

一、旧金山湾区东北新移民概况

旧金山, 华人称为三藩市 (San Francisco),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的圣弗朗西斯科半岛, 市区面积 119 平方英里, 三面环水, 环境优美, 气候冬暖夏凉, 阳光充足, 是一座临海的山城。1776 年为西班牙移民拓居地。1806 年俄国在此设哨所, 作为当时阿拉斯加的物资供应站。1821 年隶属墨西哥。1846 年归入美国时, 是一个居民不到千人的小镇。1848 年由于附近地区发现金矿, 大批淘金者涌入, 包括第一批来自中国的契约劳工。1850 年设市时, 当地人口已增至 2.5 万人, 成为美国西海岸的贸易及矿业服务中心。如今全市人口约 74 万人, 其中华人约 25 万人。平常人们所说的旧金山湾区 (San Francisco Bay Area), 广义上指的是包括旧金山、奥克兰 (Oakland) 及圣荷西 (San Jose) 三大城市在内的这一面积广袤的地区, 共有人口 750 余万人, 其中华人约 70 万人, 狭义上则指圣荷西城附近包括湾区南部硅谷 (Silicon Valley) 一带的城区。

据当地东北同乡会介绍, 东北人移居旧金山湾区的历史并不长。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旅居湾区的华人, 除了旧金山唐人街可以见到一些辽东老乡外, 在其他地方基本上难以看到东北人。至于湾区东北同乡会的建立, 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 60 年代。当时, 由日本和台湾辗转移居旧金山的东北老兵, 在金湘尔、邵中权、萧光、初志坚等几位乡亲的领头下, 以私人家庭聚会的形式凝聚自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移居旧金山的东北人。到了 70 年代初, 参加聚会的东北乡亲愈来愈多, 但是, 以家庭聚会来联络乡谊的传统方式依然如故。直到参加聚会的乡亲人数众多, 难以容纳于某个家庭后, 才改为在圣马刁五街的一处公园聚会。降至 80 年代, 乡亲们见东北移民日益增多, 颇具同乡会的规模, 才由一位姓张的同乡出面组建了“长白联谊社”, 并完全由他一人出力出钱, 独立办了三年。90 年代初, 乡亲们商议成立同乡会。经过正式选举, 推举中生代的栗适为第一任会长, 并将同乡会定名为“金山湾区东北同乡会”。东北同乡会成立后, 积极联络乡谊, 组织乡亲们参加各种文体体育活动, 例如: 举办一年一度的“松辽之夜”文艺演出晚会, 组队参加美国北加州华人体育运动大会等。在全体同乡的共同努力下, 以东北老移民为主体的东北同乡会现已成为旧金山湾区的一个颇有名气的社团组织。然而, 近年来东北同乡会有趋向老化的迹象。同乡会里老一辈的东北人因此期望从沈阳等地来的新移民成为其新鲜血液。即便如此, 就算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聚会, 也只是一部分乡亲参加, 大多数东北新移民对同乡会完全不感

兴趣。

另一方面，近 20 年来，特别是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以沈阳为主的大批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移民开始逐渐在旧金山湾区聚居。由于人数众多且集中，这些来自东北的新移民已日渐成为当代华社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当地华文媒体遂形象地称之为“东北风”。可是，与传统的移民社会不同，尽管在湾区的沈阳新移民数量相当多，但是他们却没有自己的社团组织，也没有形成类似唐人街那样的东北人聚居型社区，而是互不相干地散居在湾区各处。在湾区的东北新移民不同于早期移居美国的第一代中国移民，他们大多是城市人，其年龄一般在 30—50 岁之间，而且绝大部分原来是国营企业的职工。与那些二十年前来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相比，他们不仅学历低，英语能力也不强，因此导致他们只能在美国社会劳动力市场的底层谋生，选择职业的范围相当有限。从其职业结构来看，男性新移民多半在当地从事饮服、清扫、搬运、装修等粗重工作，而女性新移民则以从事按摩业最为常见，其次是饮服、老人护理和看护小孩等工作。

二、两个移民个案的原始访谈记录

个案一：A 男士（年龄：48 岁；籍贯：沈阳）

出国

我是 1998 年 7 月来美国的。之前，我一直在沈阳的某国营企业工作。由于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加上当时我自身的原因，不得已走上了去海外的道路。通过朋友的介绍，我以最快的速度办了签证，作为去美国进行商务考察团的一员到了美国。由于朋友的关系，我没有像别人那样付很多钱，只付了参加考察团的旅费。考察团一行除我之外，都是会按期回国的正式成员。所以，到达美国后，他们要进行例行公事访问，而我到了洛杉矶后只在饭店住了一天，就想办法联系到在洛杉矶的朋友，请他帮忙住到了一家天津人经营的家庭旅馆，从此开始了我在美国的闯荡生活。

这位朋友比我早 5 年到美国，当时为了身份正和一个台湾女人同居。他带我到家庭旅馆后，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所谓家庭旅馆，即在当地租借或分期付款买的房子，大致有四五个房间。除了主人用的房间外，其他每个房间里放有几张床，可供 4 个到 6 个人居住，一张床的价钱是 7 到 10 美元左右，是专门为新移民提供住宿的。这样的家庭旅馆在湾区到处可见，许多是和“蛇头”一起经营的。到后来我才知道，在沈阳也有和福建类似的蛇头组织。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有专门做这个行当的。蛇头本人住在沈阳，但他的家属和亲戚都移居在美国，其中有的亲戚也专门从事与新移民有关的各种工作，包括开设家庭旅馆等。90 年代末期，特别是 1999 年至 2002 年，是沈阳人移居美国数量最多的时期。据我所知，他每年至少送几百个沈阳人到美国。当时来一个人的价钱是 12 万元左右。大多数沈阳人到美国后都会利用这种家庭旅馆。

在美国的生活

我大概在家庭旅馆里住了 3 个月左右。之后，在洛杉矶的一家专为中国人开的职业介绍所里，我找到了一份汽车旅馆清扫员的差事，包吃包住，一个月工资有 1200 美元左右。汽车旅馆的工作很辛苦，没早没晚的，因为 24 小时都有客人进进出出。客人只要一离开，就必须立刻把房间打扫干净，好迎接新的客人。我不太适应这里的工作，几个月后，我向老板提出要涨薪水。没有如愿，我便辞去了这份工作。几个月下来，我有了 5000 美金的储蓄。我开始做下一步的打算。

回到家庭旅馆，听说很多人要到芝加哥去拿驾驶执照。在美国，特别是在湾区，没有驾照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但当时在湾区像我们这样没有身份的人是很难拿到驾驶执照的。正是由于 90 年代后期有许多像我们这样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美国却没有身份的人的到来，导致了像在芝加哥等地专门为中国人考驾照的生意。听说只要每个人付 450 美金，就可以很快将驾驶执照拿到手。于是，我和几个朋友结伴来到了芝加哥。前来接我们的人也是沈阳人，他把我们接到了一家

家庭旅馆，并告诉我们第二天会带我们去考场。晚饭时得知，他原来曾经在国内当过通信兵。不知是出于同样拥有当兵的经历的缘故，还是老乡的原因，他认我做了朋友，并免去了我的驾照费用。不仅如此，他还留我在芝加哥逗留了二十几天，并带我去参观旅游。

直到我经历了驾驶执照考试后，才明白所谓的驾照生意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事先被告知，考试时只要给考官 50 美金，不管考得怎么样都会顺利通过的。我在接受考试时，考官上了车后只对我说了一句“Money”，尽管我当时不会英语，但我推测这一定是要钱的意思，便将 50 美金递了过去。果然很奏效，我战战兢兢地开车跑了不到一百米的来回，考官就说了句“Very good!”，便给我开了通行证。两项考试都通过了，我顺利地拿到了驾照，为后来在硅谷工作创造了先决条件。

回到洛杉矶，从同宿在家庭旅馆的另一个沈阳人的口中得知，与加州相邻的蒙大拿州的一个地方，福建人新开的一家中餐自助餐厅正在招工。我便打电话应聘，很快那边就来人接我过去。同在自助餐厅打工的还有从北京、鞍山、长春等地来的几个人。这里是一家大的不能再大、人多的不能再多的大餐馆，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开始老板安排我去做帮厨，可我的速度太慢，不得不改去洗碗。

蒙大拿州的中国人很少，我打工的这家店的老板是从纽约过来的。快餐店本来在这个地区就不多，加上美国人又比较喜欢快餐，没有多久这个店就显得很有人气。每天客流不断。我面对的是巨大的洗碗机，负责把碗和盘子搬进搬出，劳动量相当大。工作到第 10 天，我的手不小心被牙签划破，感染发高烧。老板把我送到医院，住了 4 天。出院后，我便向老板提出了辞职。老板为我买了一张回洛杉矶的汽车票。次日，我上路回洛杉矶。中途换车休息的时候，我给在湾区的朋友打了个电话，然后临时在圣荷西下了车，到了朋友的家。这个朋友是我在沈阳时的同事，他的太太是湾区出了名的能干的女人，又开家庭旅馆，又开按摩店。

工作和未来

在他们家我足足待了 3 个月。这期间也试过做其他的工作，甚至去试过养老院的工作。那是一家中国人的养老院，但只干了一天，觉得自己很难适应，第二天便辞职不干了。几个月后，我终于找到了最合适自己的工作。一家清扫公司招人，从此我便与清扫业结下了缘分。我的老板是个马来西亚的华侨，从事清扫行当已有 12 年。他教给了我很多有关清扫的知识。

在清扫公司干了差不多 10 个月的时候，恰逢湾区华人合唱团成立，在招收团员。合唱团的团长原来是国内专业团体的演员。他听了我的唱歌以后，觉得我的声音很好，便让我成为合唱团的一员。当时，我参加合唱团也有我自己的目的。我想，能够参加合唱团的华人大部分是在湾区有固定工作的人，他们都有很好的房子。如果能和他们结识，以后对我自己的工作很有利。我一直想成立自己的清扫公司，当然就需要有客户。团长本人在湾区华人社区里教唱歌，他认识很多人。我参加合唱团后，团长和有些团员也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也给我介绍了不少人。

我渐渐地开始一边为老板做，一边筹建自己办清扫公司的事。当我自己的客户逐渐增多了以后，我就辞去了差事，成立起自己的清扫公司。开始的时候，公司的利润不是很高，但现在已经进入轨道，有固定的客户和收入，而且还雇用了几个职员。现在我有 40 多个客户，其中大部分是台湾人、香港人以及和中国人结婚的国际家庭。一般客户是半个月打扫一次，也有一星期打扫一次的。我不会英语，客户大多是懂中文的，如有需要英文的时候，我会找懂英文的人为我做翻译。我有很多朋友，大部分都是通过合唱团认识的。合唱团的演出主要在湾区的华人社区，比如春秋两季由华人体育协会举办的运动会、华人艺术家协会举办的艺术节、华人工程师协会的活动、各大学的同学会等，另外还有 60 年代成立的东北同乡会的一年一度的例会以及春节、国庆节的活动等等。在湾区，华人的这种活动很多。

沈阳人和福建人

这个地区的沈阳人至少有几千人，主要集中在圣荷西、山景城和库普提诺一带。其中，男人大多在餐厅、装修公司或搬家公司工作，女人多从事按摩行业，其他也有做保姆、餐厅服务员的。他们当中 80% 以上是政治避难身份，5% 左右是国际婚姻，剩下的就没有身份。大多数人出国七八年以上都没有回过国。

沈阳人大批来美国是从 1993 年开始的，我的同事也是那个时候来的。他们都是以商务考察的身份来的。他毕业于机械学校，后来是我们单位检验科的科长。来美国后，他一直在工厂做车工。后来工厂倒闭，他也失了业。但他的妻子很能干，他们买了房子，经营家庭旅馆和按摩店。

在湾区单身的男人很多，但能拿到像我这样的收入的人不多。湾区的沈阳人素质低，又没有福建人的那种凝聚力，经常会为了一点小事勾心斗角。福建人在美国非常团结，他们来美国后一般都去同乡的店里去打工。挣到钱后，几个同乡把钱凑到一起，为其中的一个人开店做生意，等商店有了利润后，再为另一个人集资开店。就是这样，不到几年的工夫，大部分的福建人都先后有了自己的商店。但是在硅谷，福建人很少，他们大多集中在美国东部。

个案二：B 女士（年龄：45 岁；籍贯：沈阳）

来美国的经过

我是 2000 年 2 月 8 号来美国的。虽然在美国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的英文说得非常好。这是因为我来美国不久之后，就和一个地道的美国人结了婚，加上我的客人又几乎都是说英文。是我所处的语言环境造就了我。

我刚到美国时，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有人来机场接我。在机场，我碰到了一个正在接人的老乡，是他好心地把我带到了湾区，而且帮了我很多忙。我对他非常感激，称他为大哥。现在遇到什么事时，都会找他商量。大哥不会英语，接触人的范围也都停留在华人圈里，但他心好，我和姐姐都是他从机场“拣”到这儿的。

我在国内技校毕业后，分配到铁西的一家国营机电厂工作。改革开放的浪潮，把我也从工作岗位上推到岗位下。我不得不改行去卖小商品，挣到一点钱后，1987 年，我用挣来的钱自己开了一家幼儿园。当时经营得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 7000 元左右的收入。当时，我已经结了婚，丈夫原来也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后来下岗自己找门路做起倒卖木材、钢材等建筑材料的皮包商生意。他经常去南方出差。不久，他在杭州附近买了一栋房子，我们还一起去看，并开始着手装修房子。我们在饭店住了一个多月，因为房子的装修还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我也有事要做，我们决定我先回沈阳，他留在那里。可谁想到，没有多久他和我失去了联系，我很着急，当我千方百计地找到他的电话打给他时，竟然是另一个女人代替他接电话。当时，我们的孩子只有 8 个月。就这样我们分居了近 4 年后，不得不离婚分了手。

在一段时间内，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成天和朋友们凑在一起打麻将度日。但我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便想试着学点什么。我很喜欢烹调，于是就去了烹饪学校。人都说“人挪活，树挪死”，还真是这么回事。在烹饪学校我有了新的朋友。有一天，我们一起吃饭时，她问我想不想去国外闯荡。她告诉我说，她的哥哥专门组团去美国，只要付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签证，她还说最近有一个团马上就要走。当时的费用是 7 万元。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可我没有护照不能马上出发。我想到了我姐姐，她也在开幼儿园，不久前她也曾经从朋友那里听到有机会出国的事，并已经先办理好了护照。我和姐姐商量后，决定让她先跟团走，在这期间我开始办理护照。姐姐匆匆忙忙地把幼儿园关了门，没几天就去了美国。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可笑，人好像都疯了，一门心思地往外奔，美国真的就有那么大的魅力吗？会让人不顾一切，甚至抛家舍业。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姐姐不跟随代表团回到国内，下一个团的签证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姐姐跟着团在美国转了 20 多天后，回到了中国。因为签证是半年有效，她可以跟随下一个团再到美国。

就这样，等我们团的签证拿到后，我们姐俩一起来到了美国。

工作

到达机场后，我们举目无亲，不知所措地在机场徘徊，幸好遇到了老乡，他把我们拣到了这里。他帮我们找到了清扫的工作。姐姐曾经在他那里干。我没有固定的地方，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了工作。从湾区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有关招募按摩小姐的广告，便去应聘，从此进入了按摩行业。

最初的按摩店，从老板到店员都是沈阳人，大家经常为客人和钱争吵不休。我只是一门心思地去掌握按摩技巧和摸索行业的门道，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创业打下了基础。我记电话号码的能力极强。我没有通信录，我所有的客人的号码都在我的脑子里。当然，现在更多的是靠手机的记录了。

在这里，有两种工作可以做：一种是像餐馆、工厂等那些普通的工作，非常辛苦，薪水又不高；另外一种就是如按摩之类所谓的特殊职业，这种工作对初来乍到的女性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又不用语言，挣钱又多。在按摩店工作，明文规定是要有按摩资格的，即有学习或从事按摩工作的证明。但这里在店里工作的大部分小姐，都没有这样的证书。一般是进店时，老板会先教给小姐们一些基本的手法，剩下的就是靠小姐们在实践中去学了。学得好，挣钱就多。按摩店是处在合法和非法夹缝当中的职业，每个店都必须有各自的一套经营办法。因为美国的法律很健全，搞不好就会被警方查封。

东方医学虽然受西方欢迎，但东方医学的“推拿”概念在这里是很模糊的。在这里有很多按摩店，特别是中国人开的店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东方医学的幌子，实际上在从事各种法律上不允许的服务。和其他非法的职业一样，这种按摩店的工作是伴随着危险的，运气不好就会被警察抓去。这里大部分的按摩小姐都有曾经被警察带走的经验。按摩店被查封、小姐被抓在这里是家常便饭。我很幸运，一次也没有被抓过。

按摩店有两种，一种是面向美国人服务的店，另一种是面向香港、台湾和大陆人的店。后者根本就不需要会说英语，而且这种店大部分都做“卖春”的生意，按摩技术也不会要求得很高。前者要求小姐会说一点英语，要有较好的按摩技术，但根据客人的要求有时也做特殊服务。

我最初进的店就是面向美国人服务的店，在那里不管是按摩技术还是英语，我都是从零学起。这个地区女人比男人少，女人在这里比男人好生存。我在第一家按摩店工作时，就留心找到了许多自己的客人。这些客人在我离开店独立后，都成了我的固定客户。我现在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是以电话联系、出差的方法到客人指定的地方去做。每个客人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根据服务的好坏和客人的心情，我得到的费用不同。客人高兴了，就会多给我钱。我一小时最少可以挣到200美金。如果一天有5个客人，我就会有一千美金的收入。有的客人还不只给我200美金，300、500的都有。我一天的客人多的时候会有十一二个。在湾区的按摩小姐中，属我挣得多了。我从来不做广告，都是客人来找我，因为我有纯熟的按摩技术。根据客人的要求，我也会做一些特殊服务。我认为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只要成为行业的第一就是好。我是幸运儿，我只用了两三年，就已经拥有很多客户，其实这和我能吃苦耐劳的性格有关。

我从不认为做特殊服务有什么不好。它和别的工作一样，也是生存的手段，而且这种工作收入又高。在这里能做好特殊服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学会英语。这种工作还会伴随更多的危险，因为我的工作对象，可以说是一个孤独群体，还有心理变态的，总之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不小心还会被偷盗、强抢、强暴，除此之外还有会被警察抓的危险。能把客人拴住，又不让自己陷于危险之地，并非容易之事。在接新的客人时，必须小心翼翼。我对人很热心，也处下一些朋友，但我在工作上喜欢独往独来，不想开什么店，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促使我独立干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店里时，由于自己的客人多，招来同事的嫉妒，她们跑到老板那里说我的

坏话，结果我被老板开除。沈阳人真的是没有别的地方的人那样团结。

来这里的沈阳的女性，大部分都在做按摩小姐。沈阳人在这里是一个畸形的群体，沈阳的女性大多希望找一个美国人结婚，主要是为了解决身份问题，谁也不会想找沈阳男人的。而且，90年代来美国的沈阳男人没有几个像北京、上海人那样读书成材的。另外，美国女性更不会把沈阳男人视为交往对象，沈阳男人在这里是没人要的，这是一种当地的现实造成的结果。

结婚与今后的打算

我来美国之前就考虑过，到了美国后，一定想办法留下来，哪怕只是为了钱。我曾经为了合法签证想到了去读书，但昂贵的学费让人头疼。可是要想在美国长期居留下去，没有合法身份是不行的。想在这里得到合法身份，除了申请政治庇护身份之外，只有和美国人结婚一条路。可结婚的道路并不好走。

我和我丈夫是通过一个中餐馆老板介绍认识的，他今年已经60多岁了。我们认识后很快就结婚了，当时我来美国没有多长时间。我不会英语，和他没有对话。没办法只好买个笔记本电脑，靠查字典和他笔谈。他说一句，我查一句，然后回答他一句。最初的半年里，我们家里几乎没有说话的声音，笔谈曾经是我们交流的唯一的手段。我的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每天在家里流泪，想到为什么不和中国人结婚而吃这个苦。我也相信来美国的人几乎都有一本辛苦和眼泪的奋斗史。现在，我的语言障碍是没有了，这是我辛辛苦苦学习得来的。为了一张绿卡，什么样的苦我都忍了。

我和丈夫是先结婚，后恋爱。虽然在我们交流很困难的时候，他曾经打过我，但我们感情现在很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关系。他是做室内装修的，对颜色很有眼光，而且非常喜欢干净。我们现在住在普通的公寓里，他有工作，我也有收入，我们不会为生活发愁。他知道我的工作，但从来也不干涉我。我们从不把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

我们家没有什么财产，也不准备买房产。如果买了房子要每个月付分期付款，加上地税等将会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我丈夫现在患有癌症，我不想留下一笔由自己来偿还的债务。我喜欢在美国生活，至少我喜欢挣这里的钱。如果哪天我丈夫去世了，我也不会再结婚，我丈夫为我留下的储蓄和保险金足够我以后的生活的。现在，我还没有回中国的打算，也许上了年纪后会回故土养老。

三、东北新移民与理论层面的探索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有关跨国移民活动的理论研究日趋活跃。学者们借助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既有理论体系，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跨学科研究，在各种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相关的理论分析架构。就本文所关心的中国东北新移民之课题而言，笔者以为，可以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社会资本、移民网络及非制度性资源分配等学科的理论模式，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新古典经济学移民理论的解释

首先，值得探讨的是东北人为何要在改革开放实施20余年后的今天大举向海外移民？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以为，新古典经济学移民理论可以有所作为。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移民理论脱胎于上个世纪50年代W. Arthur Lewis用于解释国内劳动力流动之“均势经济发展模型”（Equilibrium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也称为“利用无穷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模型”（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odel）。按照W. Arthur Lewis及该学派其他著名代表如Gustav Ranis和John C. H. Fei等人的理论，移民的根源在于国家或经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当劳动力和资本在地域上分布不均时，就会发生移民现象。换言之，倘若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经济部门的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来说出现短缺时，劳动力的价格（亦即工资价格）

就会上升；反之，则劳动力价格会下跌。其结果，人口就会从劳动力充足且工资较低的国家、地区或部门，流向劳动力短缺而工资水准较高的国家、地区或部门。如此的人口流动，将促成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重新配置，长远来说还可能拉平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工资水平，进而消除原先的经济收入差距，最终达致经济均势发展^[1]，也就是说，从经济层面来看，移民的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必须存在着一定的收入差距，而且这一收入方面的差距必须要大到足以让移民愿意下决心、冒一定程度的风险远走他乡。在东北新移民的个案研究上，新古典经济学移民理论这一框架用于解释东北人为何闯荡海外显然颇有说服力。上述 A 男士的访谈显示，在美国西海岸汽车旅馆当清洁工，每个月便可赚到 1200 美元（近 1 万元人民币），而 B 女士在按摩院工作，每个小时就可挣到 200 美元，有时一天可以挣到 1000 美元（约 8000 多元人民币）。与东北各地随处可见的下岗待业之窘迫情况相比，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水准比东北三省国企职工工资收入的平均水准高出了数倍甚至是数十倍。毋庸置疑，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自然会对中国城镇下岗职工构成莫大的移民拉力。

（二）制度层面的原因

然而，倘若仅仅具备经济收入方面的诱惑因素，仍然无法清楚地解释为何近 10 多年来是东北人而不是中国其他内地省份的居民开始逐渐地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主力军。因此，笔者认为，还需要从制度方面去寻找东北人移民海外的深层原因。我们知道，近 20 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日益深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对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替代，大批国营企业进入痛苦的体制改革阶段，造成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国营企业职工因结构性失业而下岗，其中尤以中国传统的重工业基地之东北三省为典型。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统计，到 1998 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已累计达到 1350 万人；而从 1998 年至 2002 年底，又有 2700 多万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国务院研究室的调查报告亦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估计约达到一亿人以上，而全国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总数估计在 4000 万至 6000 万人之巨。^[2]在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中国公民为了生存，势必要外出谋生。中国国家统计局于 2000 年所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表明，目前全中国的迁移人口超过 1.25 亿人，其中省内迁移为 9146 万人，跨省迁移为 3314 万人。在省内迁移人口中，52% 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跨省迁移人口中，78% 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这一系列的数字表明，中国农民和城镇下岗职工正在大规模、高速度地向城市和海外迁移。^[3]中国政府的人口普查数据没有详细地罗列出过去 25 年内究竟有多少农民和城镇下岗职工迈入了国际移民的行列。不过，显然正是因为上述体制方面的变化，才使得大批东北各地的国营企业职工被迫从原单位“释放”出来，开始自谋生路的奋斗生涯。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放宽对公民到境外旅行的限制，在国家边境管理制度上逐步与国际社会接轨，从而使得中国公民可以手持合法的旅行证件进行跨国移动，并进而融入国际移民的行列。如果不是因为东北地区大中型国营企业所经历的大规模的体制改革以及国家在边境管理体制等制度性方面的变化，即便美国劳工市场的收入再高，也绝不可能看到大批东北人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打工。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9 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 30 年间，很少有东北人移民海外，可为例证。笔者在旧金山湾区访谈的上述两个沈阳新移民，在来美国之前亦均为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其中，A 男士因为所在国营企业的效益不好而出走海外，B 女士因企业体制改革的浪潮将其推入下岗工人的潮流中后，先是改行去卖小商品，之后又用挣到的一点钱自己开了一家幼儿园，最后在烹饪学校朋友的劝说下成为美国旧金山的新移民。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制度变迁对东北人成为新移民的影响。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东北人移民网络

经济层面的理论说明了东北人为何要成为新移民，制度层面的解释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东北人何以能毫无羁绊地离开原来的单位而成为新移民。可是，仅有这两个因素，仍然不足以令人

信服地说明东北人如何离开中国到海外以及如何生存。因此，笔者以为，还应当借助社会资本、非制度性的社会资源配置及移民网络等理论模式来进一步剖析当今东北人的国际移民现象。

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渊源和研究由来已久，而且早在19世纪末经济学界就已提出过“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Glenn C. Loury于1977年首创。^[4]其后，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将此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并对其展开全面细致的分析。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各种资源的集合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皆可通过占有某种持久不衰的关系网络而获得社会资本，而这一关系网络是彼此所熟悉的、得到承认的并或多或少已制度化的网络。”^[5]至于移民网络，则指的是海外移民社会与故乡以及返国的移民与其亲友同胞之间的各种纽带关系。由于移民网络可以为准备移民海外的亲友或同胞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援，包括提供海外工作市场的准确信息、协助提供移民担保和贷款、提供合法及非法的旅行证件、安排出境、代找律师、介绍合适的工作以及为初抵他乡异土的新移民提供住宿等，因此，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国际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使得跨境迁移活动获得惯性和永久的动力，能够自行不断地进行并扩大规模。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移民网络的理论应肇始于William I. Thomas和Florian Znaniecki两位学者有关迁徙欧洲及美国的波兰农民之移民研究。^[6]不过，将移民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挂钩，并将其视作一种社会资本，认为移民网络能够让移民获得经济上的种种好处，却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人口社会学家Douglas S. Massey及其合作者，在Pierre Bourdieu和James Coleman两人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于1987年首先提出。^[7]Douglas S. Massey与Joaquín Arango均一再强调，社会网络对移民的重要性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可以说，网络是移民发生并能够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的原因和内在机制。许多人之所以成为跨国移民，是因为跟他们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的人已移民在先。此外，移民网络还具有乘法效应，一个人到了海外，便能够逐步地将家乡的亲友一连串地带到国外定居，所谓的“链锁移民”（chain migration）即为此意。

在东北人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个案研究上，若仔细辨析，同样可以辨识出其自身的移民网络和社会资本，尽管与具有悠久移民传统的福建人及浙江温州人相比，新兴的东北人移民网络的范围或许没有那么大，能量或许没有那么强。可是，在上述的两个访谈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A男士与B女士皆经由东北人的移民中介安排，通过既有的东北人移民网络到了美国。两人都是以参加商务考察的名义，用合法的旅行证件和签证离开中国后进入美国。像其他大部分的东北人新移民一样，两人利用美国法律的灰色地带，在美国逾期逗留，然后在当地工作或与美国公民结婚，从而达到逐步在美国定居扎根的目的。如访谈记录所显示的那样，像福州地区和温州地区一样，东北地区同样存在着经营国际移民活动的民间地下移民网络，也同样有“蛇头”。A男士曾经提及，有的蛇头本人长期居住在沈阳，可是他的家属和亲戚都已移居美国，而且也都参与经营东北人的国际移民活动，包括协助初抵大洋彼岸的东北乡亲安顿住宿及安排寻找工作等。此处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A男士在访谈中所提及的“家庭旅馆”以及东北蛇头经营非法移民生意所获得的暴利。很显然，早期来美的东北人历经艰辛在美国站住脚后，马上发现国际性移民是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他们当即返乡建立起了自己的非法移民网络。这些民间的移民中介或掮客不仅协助东北乡亲偷渡海外，而且还在旧金山湾区租借房屋或分期付款购买房屋，建立起接待新移民的家庭旅馆。从商务考察团的申请和组建、护照和签证的申请与办理以及机票定购和旅行日程的计划，一直到安全抵达美国后的住宿安排，东北人移民网络的经营和运作不可谓不成熟完善。更令人吃惊的是东北人移民网络的规模。根据A男士的自述，他所认识的这名蛇头每年至少能够将几百个东北老乡通过商务考察的渠道输送到海外。

（四）社会关系网络资源配置理论与东北新移民

除了移民网络之外，作为社会资本十分重要之组成部分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配置问题亦值得

重视。熟悉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都知道，作为非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其本质就是一种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包括维系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所必需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文化规范和功能。社会资本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往往能够在市场和政府无能为力之处起到重组或调节资源配置并促进社会结构转型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尤其是在华人社会经济活动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协调人际关系行为的非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往往是较之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更为节约成本的资源配置方式，起着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资本对资源的配置经常是通过广泛的社会交换来实现的，权利、人情、工作、职位、地位等均可作为稀缺资源或特殊的等价物来参与交换，而当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去争取自身的利益时，社会关系网络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此外，更重要的是，华人特别重视社会关系网络，也最善于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华人，还是港、澳、台及海外的华人，都具有将家族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进行泛家族化的习惯和本事。这一点，大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关于社会网络资源配置在研究国际移民课题上的重要性，需要特别指出并加以考察的是新移民在海外寻求工作时所依赖的网络关系之性质。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Mark S. Granovetter 堪称最早意识到此问题并加以深入探讨的学术先驱。1973 年 5 月，Granovetter 在《美国社会学学报》上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际关系划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两大类。在随机抽样调查美国波士顿郊区白领阶层转换工作的基础上，Granovetter 指出，由家庭、亲戚、同学、老朋友等构成的强关系（亲密关系）维系着群体和组织内部的关系，而由关系较疏远的个体所构成的弱关系（不太密切的关系）则在群体和组织之间建立起纽带关系。因为群体内部的个体在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方面的相似性较高，其所了解的事物和所熟悉的人往往是相同的，故而其所传递和分享的信息往往重复性较高，无助于群体内部的个体寻找工作。与之相反，因为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其异质性强，分布范围广，故常常能有效地充当信息桥（Information Bridge），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线去获得有关新工作的非重复的信息。换言之，Granovetter 的研究结论认为，弱关系是给予人们新机遇的重要来源，它担当着影响社会凝聚力的角色。^[8]此后不久，专门研究社会资本问题的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林南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修正并补充了 Granovetter 的理论架构，强调弱关系中其他诸如权利、财富和声望等资源均可以进一步强化弱关系在分配社会资源方面的作用。^[9]1997 年，当时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边燕杰根据自己在中国天津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发表题为“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一文。与此同时，他又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宋安合作发表了“中国与新加坡两地的关系网络与求职变化”一文，对 Granovetter 和林南的研究结论进行挑战，认为弱关系理论模式并不适用于华人社会，华人在求职时往往更依赖于强关系网络。^[10]

笔者以为，在研究中国当代跨国移民的社会资源配置问题上，无需过分执着地争辩究竟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在起着主导作用，非 A 即 B 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显然容易失之偏颇。实际上，前述的访谈记录显示，东北人在移民离开中国及设法在美国旧金山落脚的过程中，是强弱关系两者并用，能接触或掌握到哪一种社会关系，就利用哪一种关系，只要该关系能够有助于自己顺利、安全地移民到海外并找到工作就行。

在 A 男士的移民经历中，我们看到，他先是通过强关系（朋友）的介绍，以最快的速度办了签证，作为去美国进行商务考察团的一员到了美国。而且，由于这个强关系的作用，他节省了自己的移民成本，“没有像别人那样付很多钱，只付了参加考察团的旅费”。抵达洛杉矶后，他又一次使用了强关系网络，找到了比他早 5 年抵达美国的一个朋友，由这位朋友将他接送并安排住进了一家天津人经营的家庭旅馆，从此开始其在美国的闯荡生活。大约因为这个朋友已受到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A 男士被送进家庭旅馆后，这个朋友便没有再露面。A 男士在美国的强

关系纽带因此而突然断裂。在这种情况下，A 男士只好转而求其次，开始寻找身边的弱关系网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汽车旅馆的清洁员，而这份差事是他在洛杉矶的一家专为中国新移民开设的职业介绍所里找到的。职业介绍所的老板和汽车旅馆的老板他原先均不认识，自然属于弱关系。但是，通过这些弱关系，他却得以结识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新移民，开始获得有关旧金山湾区的各种寻找工作的信息，并逐渐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于是，新结识的朋友（弱关系）教他如何到芝加哥去考驾驶执照，如何向美国考官行贿。与此同时，由于他乡巧遇东北乡亲的缘故，热心豪爽的沈阳老乡不仅免去了他的驾驶执照费用，还热情地招待他在芝加哥观光旅游了 20 来天。A 男士的第二份工作仍然得益于他在家庭旅馆建立的弱关系网络。从这位与他居住在同一家家庭旅馆的沈阳老乡口中，他获得了有关福建人新开的一家中餐厅正在招工的信息，然后前往属于弱关系的福建人的中餐厅打工。A 男士洗碗受伤辞职后，到沈阳老同事（强关系）的家中休息了 3 个月。其间，他多番外出寻找工作而未果。由此可见，强关系网络在协助初抵他乡异国的中国新移民寻找工作的问题上，的确不如弱关系网络。若忽略只干了一天的养老院工作不计，则 A 男士的第三份正式工作是清扫业，仍旧是来自弱关系（清扫公司正常招聘清洁工）。值得注意的是，一旦 A 男士在当地社会站住了脚跟，有了稳定的职业，他就开始有目的地逐步扩大自己在当地华社中的关系网络，希望将新结识的弱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强关系，以利于自己的业务扩展。通过参加湾区华人合唱团，他扩大了自己的客户来源。照他自己的说法，“我参加合唱团后，团长和有些团员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也给我介绍了不少人”。除了合唱团之外，A 男士还积极地参加由当地华人其他社团组织的活动，诸如华人体育协会、华人艺术家协会、华人工程师协会、各大学的同学会、东北同乡会的聚会等。

B 女士的移民经历同样说明了强关系与弱关系在东北人移民海外过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资源配置的特殊角色。B 女士通过在烹饪学校结识的朋友（强关系）而进入沈阳人经营的地下移民网络。从访谈记录中“她的哥哥专门组团去美国”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得知，该朋友的哥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门从事非法移民生意的“蛇头”。在地下移民网络的安排下，B 女士姐妹俩一道冒险来到了旧金山。幸运的是，她们一下飞机，就遇上了一个正在接客人的好心肠的沈阳老乡，将她们带到了湾区。虽说是初次见面相识的弱关系，但在异国遇到乐于助人的乡亲毕竟不容易。于是，姐妹俩立刻拿出中国人泛家族化的传统本事，以“大哥”来称呼这个热心肠的老乡。这一声“大哥”看似简单平常，在举目无亲的海外却有相当的份量，既包含着姐妹俩对老乡的感激之情，又十分聪明地在短时间内以虚拟的亲缘纽带将刚刚结识的弱关系上升为强关系。可是，尽管有了强关系“大哥”的照顾和协助，姐妹俩寻找职业的过程似乎仍然不顺利。因为“大哥”不会英文，其所熟悉及活动的社会圈子亦有限。所以，“大哥”只帮她们找到了清扫的工作。从 B 女士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姐妹俩都不曾在清洁工的位置上久待，很快就各自找到了新的工作，各奔东西。B 女士是通过正常的招聘渠道，从当地华文报纸的广告中找到了按摩小姐的工作，属于当地华社的弱关系圈子。然而，正是弱关系网络所提供的信息，使得 B 女士在旧金山湾区拥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此后的数年，B 女士不仅越干越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客户网络，而且在当地一个华人中餐馆老板的穿针引线下，居然跨越族群界线，与一位美国人结婚成家，并进而将自己的业务网络扩展到了美国人圈子内，获得丰厚的工作报酬。

从上述沈阳新移民 A 男士和 B 女士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强、弱关系在东北人移民海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适用范围。从东北人进入移民网络、办理旅行证件、离开祖国直至抵达美国的这一环节上，强关系无疑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可是，一旦新移民进入外国，原来在国内的强关系网络则基本上不复存在，无法继续为新移民提供必需的种种帮助。于是，海外移居地的弱关系网络的地位开始上升。事实证明，在中国新移民寻找职业的问题上，主要是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在发挥着主要作用。笔者以为，在这一点上，本文所进行的个案研究可以进一步修

正及补充边燕杰有关强关系网络在华人社会寻找工作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之结论。换言之，在现有的华人社会中，无论是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还是新加坡华人社会，边燕杰关于社会资源配置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亦即强关系网络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同样是华人寻找职业，在华人作为少数民族的外国，尤其是在华人新移民的社区中，这一情况就不同了。笔者的访谈和研究证明：弱关系网络对于华人新移民在海外寻找工作的协助往往更加有效，这一点恰与Granovetter、林南等人对其他族群寻找工作的研究结论相符。

四、结 论

以上的访谈记录和研究分析显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东北新移民已开始成为当代中国国际移民潮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已持续 20 余年移居美国的福建新移民相比较，东北人移民海外的经历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从移民的动机和背景来看，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的民众具有悠久的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与传统，移民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到亲戚家去串门探亲那样，十分平常。但是，对安土重迁的东北人来说，要让他们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东北人的文化背景和经济观念与南方沿海地区的居民相去甚远。与地少人多的福建和广东相比，东北人相对来说在生活上向来没有什么危机感，更没有向外移民的历史传统。倘若不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迫使大批国营企业职工下岗，自谋生路，大约东北人是不会走出国门的。从此意义上说，福建人和温州人是主动走出国门，而东北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离家到海外去拼搏的。再从移民途径来看，南北两地不少中国新移民走的似乎都是非法移民海外的渠道。唯一有所区别的地方在于，大多数东北新移民几乎都是通过参加由地下移民中介所安排的商务考察团持合法旅行证件及签证进入美国的。一旦抵达美国，他们便想方设法地逾期滞留。正因为东北人不及福建人那样团结，不像福建人那样在方言、地缘、血缘等组带的作用下，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因此，一般来说，东北新移民在海外移居地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不甚理想，成功者寥寥无几。

此外，从学理的角度来分析，上述的讨论说明，近 10 多年来东北地区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移民海外的现象，其中既有古典经济学移民理论所提出的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中国社会内部制度变迁的深层因素。而非制度性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中的强、弱两种关系网，则对当代东北人的跨境迁徙活动及其在海外寻找工作等有着莫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东北人对自己生活圈内社会资本的充分运用和发展，加上民间移民网络和非制度性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协助，大批东北人得以源源不断地向海外移动，导致世界上许多地方先后刮起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东北风”。这种全球化视野下的人口移动将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趋势，究竟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对作为人口移出国的中国社会以及作为人口移入国的海外各国社会及当地华人社会带来冲击，仍有待于各相关学科的同仁进一步思考及研究。

[注释]

- [1] W. Arthur Lewis, “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 22, 1954, pp. 139- 191; Gustav Ranis and John C. H. Fei, “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1961, pp. 533- 565.
- [2] 有关中国面临的严重的失业人口问题之研究以及中国政府公布的相关统计数字，参见杨宜勇：《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年 1 月；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我国的就业形势与对策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基金资助课题系列报告（内部发行），2000 年 3 月；蔡 主编：《2003 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7 月；莫荣主编：《2003—2004 年中国就业报告》，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年 1 月。
- [3] 蔡 主编：《2003 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1 页。

- [4] Glenn C. Loury,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in Phyllis A. Wallace and Anette M. LaMond eds.,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exington: Mass.: Heath, 1977, pp. 153–186.
- [5] 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119.
- [6] William I. Thomas and Florian Znaniecki,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2 Vol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8–1920), New York: Dover, reprint, 1958.
- [7]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pp. 241–158; 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Douglas S. Massey, Rafael Alarcón, Jorge Durand, and Humberto González, *Return to Aztlan: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Western Mexi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8]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May 1973), pp. 1360–1380;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Sociology Theory*, Vol. 1 (1983), pp. 201–233.
- [9] Nan Lin, Paul Dayton and Peter Greenwald, “Analyzing the Instrumental Use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7 (1978), pp. 149–166; Nan Lin, John C. Vaughn and Walter M. Ensel, “Social Resources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Forces*, June 1981; Nan Lin, Walter M. Ensel and John C. Vaughn,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6, No. 4 (Aug., 1981), pp. 393–405; Nan 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0] Yanjie Bian,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No. 3 (June 1997), pp. 366–385; Yanjie Bian and Soon Ang, “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 Vol. 75, No. 3 (March 1997), pp. 981–1005.

• 书讯 •

《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出版

任贵祥博士的新著《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已于2005年5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之一，也是作者1997年独自承担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全书共分七章，51万余字。

该书围绕“华侨是革命之母”、“华侨有功革命”和中国“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近代以来海外华侨与祖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作者认为，华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一是投身于改良救国运动，二是大力支持辛亥革命，三是参与讨袁护法斗争，四是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五是奋力声援国民革命，六是无私报效祖国抗战，七是在国共决战中徘徊抉择。该书自成体系，纵横结合，将华侨与中国革命有机串联，使思想体系和重大事件达到融会贯通；同时，在内容与基本线索上突出华侨与国共关系的主线，兼顾华侨与其他党派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体现出多学科多线索的综合交叉运用。总之，该书以确凿的资料和客观的史实，实事求是地阐述了华侨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在一定层面上弥补了国内有关研究的空白和薄弱之处。（雷雨）